

思想時代

◎ 程巢父 / 著

◎ 華夏出版社

思想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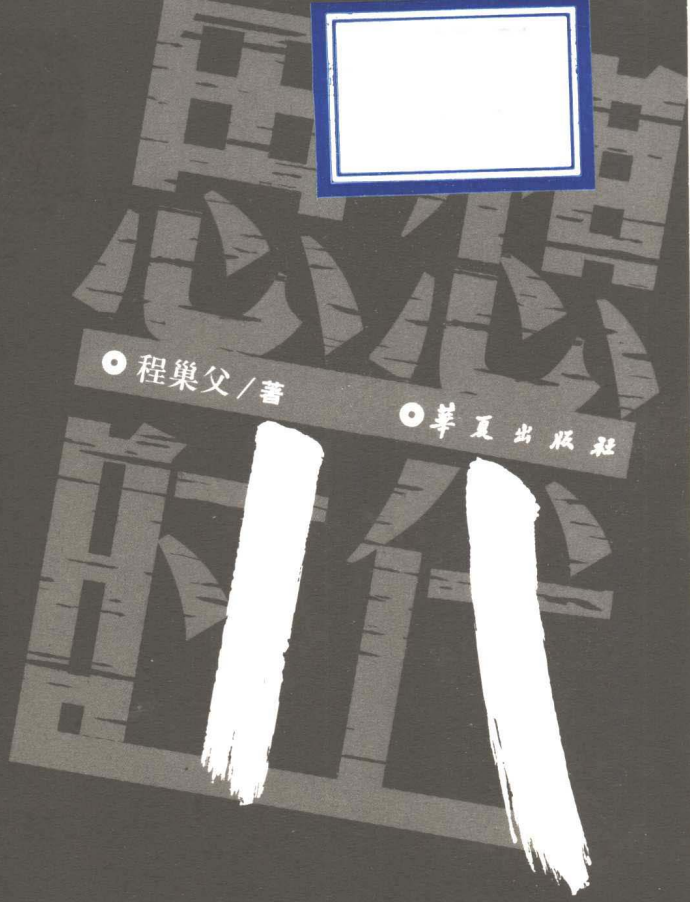
上個世紀 30~50 年代，陳寅恪、胡適的思想整整影響了一代人，今天，他們的思想仍閃耀着光芒。《思想時代》是作者對陳寅恪、胡適思想研究的成果集，這其中既有作者對歷史偏見和誤解的糾正，也有一些不為常人所知的

歷史 史 實 ◎



程巢父 /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时代/程巢父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

ISBN 7-5080-3466-X

I. 思… II. 程… III. ①陈寅恪(1890~1969) — 人物研究

②胡适(1891~1962)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81②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9300 号

思想时代

程巢父 著

策 划: 李雪飞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16 开

印 张: 17.25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为陈寅恪、胡适说话

钟叔河

与程巢父先生相识之初，只读过他几篇谈武昌鱼和洪湖藕的散文。对名物的博识和考证工夫，散见于看似平淡却颇含趣味的记叙之中，且不乏婉而多讽之致，正是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后来才知道，写写这类文章，不过是他的精神散步，不过是他作为调剂的一种消遣。

近年来他做的正经工作，如沈曾植研究等，都属于专门，非我这样不学之人所能置喙。但他发表在《东方文化》、《书屋》和《文汇读书周报》上，如今又辑印成这一册的论陈寅恪、胡适的这系列文章，面向大众为前贤说话，我却还看得懂。

陈寅恪和胡适的文化价值，半个世纪前早就有了共识。几十年之后，却还需要人来为他们说话，岂非笑话。不幸的是，笑话却成了事实。如果再倒回去二十多年，则为陈寅恪、胡适（尤其是胡适）说话亦不可能。光有这一条“罪名”，戴上“帽子”就有足够的条件了。

既要为前贤说话，便免不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免不了有所争辩。我不是一个好辩的人，不想在程君和别人之间来当评判。我以为只要都摒弃了“封建馀孽”、“美国洋奴”这类“国骂”的影响，都能够实事求是承认陈寅恪和胡适的文化价值，便有了“求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尽可以各是其是，各说各话，这不正是陈寅恪、胡适他们终身追求的“允许别人和自己不一样”的自由主义的真谛吗？

程君在为陈寅恪、胡适说话的时候，比较注意从他们的人格道德方面着眼和立言。《陈寅恪、朱延丰师弟关系及学风》一文中，详述了陈氏对自己的研究生朱延丰严格要求，甚至力主不派其出洋；但对朱失恋后“两个星期没上课，又不在宿舍住宿”却非常着急，派人各处去找；为了给朱找到“寄托”，还写信给胡适，推荐朱试译西洋历史书。后来朱延丰学业有成，原来被陈氏认为“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的毕业论文《突厥通考》，经过十年“详悉补正”，终于成书出版，陈氏又欣然为之作序。程君以充满感情的笔调介绍了“这一对清华师第三十年代初在一桩具体事务的处置上所显露的学术精神”，接着又叙述了最近“在南方一所名牌大学里一位终身教授”及其弟子的故事。二者反差之大，对比之强烈，读了以后，使人不禁为五十年来知识分子人格的贬值和学术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悲哀，更不禁要掩卷深思其何以致此。这恐怕也就是

程君用心用力写作的目的，体现了一种厚重的人文关怀。

“论人文”，“玩文化”，现在已经成了某些人的“时尚”。但程君决不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并不自作高明地来“论”，也不濠上观鱼似地来“玩”，而是把自己作为历史变迁中的一分子，学而思，思而学；故能于反思之后，深切感到胡适的被批判、陈寅恪的被当作“白旗”拔掉，对于学术和文化，进而对于学术道德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实在有重大的影响，从而感到一种深切的痛楚，遂不能已之于言。他自己承认：

“我的整个少年、青年成长期，都是以他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以他人的眼耳当自己的眼耳的失知失觉期。迄于中年，通过阅读胡适，才知道梁（启超）氏‘新民说’对整整一代人的影响，才认识到‘改良主义’岂可等闲视之，……明白了‘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的陈寅恪，他所秉持的价值不是滞后而是超前的……”

我虽然也未必同意程君对陈寅恪和胡适的每一点认识，却不能不佩服他对前贤也就是对文化和学术自由、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深切关怀，并敢于为之说话的勇气。我以为，这一点比什么都更为难得。

陈寅恪“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与时务学堂故址（中山西路三贵街），和我家的距离都在四华里左右，那两处则相隔只有两里来路。光绪二十三年，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长沙协助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等办时务学堂，常在通泰街家中 and 时务学堂间来往。此时寅恪已经七岁，其兄衡恪（著名美术家陈师曾）则已二十一岁，寅恪是很有可能由父兄带着到过学堂的。如今到处造“假古建”，湖南修“炎帝

陵”、“舜帝墓”尤其热心，对于在近代文化历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时务学堂故址却全未顾及。我曾在报纸上写过文章，建议将梁启超手书“时务学堂故址”六字，在中山西路三贵街口刻石留念，附近广场上则可建座浮雕，为戊戌在湖南办时务学堂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造像。陈三立的身后可以站着陈师曾，手里可以牵着陈寅恪，各人的名字可以刻在各人的脚下。这样岂不可以为长沙增一胜迹，实在比建朱熹、张轼的铜像有意思得多。这件事没有同程君讲过，如果征求他的意见，想必也会欣然表示赞成的吧。

2004年4月27日于长沙

目 录

陈寅恪研究二题 /1

人性人情总相通 /17

——就陈寅恪“话题”与止庵先生商榷

仁者之怀 /38

卞孝萱娱母 陈寅恪寄诗 /46

胡适的进步论 /53

——为纪念胡适之先生诞辰 110 周年而作

胡适从传统文化发掘自由资源 /97

关于《智者千虑》所涉史实的辩证兼及学风 /123

胡适重才济人之德 /142

杜威与五四 /151

——纪念五四及杜威来华讲学八十周年

关于胡适评价问题 /158

胡适与京剧 /163

张中行误度胡适之 /173

——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辩证

刘半农与胡适之间 /186

——就陈四益《乱言未能成一笑》一文提出实证

胡适来往书信又添一通 /200

——新出刘半农致胡适遗札书后

王实味与胡适 /207

又见胡适手札一通 211

储安平与胡适 /215

——精英分子书信中的历史消息

士气与正气 /256

——储安平致傅斯年的两封信

陈寅恪研究二题

一、师风照弟品 正气养纯才

——陈寅恪、朱延丰师弟关系及学风

1933年2月，陈寅恪先生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考试委员。翌年有邵循正、朱延丰两名研究生毕业。陈先生力主只派邵循正一人出洋，形成会议决议。后来此事牵及系主任，传闻不派朱延丰是系主任与之有意见，陈先生为此事于1934年1月8日有致梅贻琦校长函：

月涵吾兄先生：

执事朱君不派出洋事，当日教授会议时，弟首先发表宜只派邵君一人，廷黻先生时为主席，询问大家意见，并无主张，

迨弟发表意见后，全体赞同，无一异议。弟之主张绝不顾及其他关系，苟朱君可以使弟发生出洋必需之信念者，必已坚持力争无疑也。至谓系主任与之有意见者，他教授并随同系主任者，则不独轻视他教授之人格，尤其轻视弟个人人格矣。总之，此次史学系议决只派邵君而不派朱君一事弟负最大最多之责任。此中情形经过如此，恐外间不明真相，特函陈述，如有来询者，即求代为转达，藉明真相而祛误会为荷。敬叩日安。

弟

寅恪顿首

一月八日

（见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

陈先生立身行事，秉公恤人，敢担责任，堂堂正正，这样的风范固然与他的学养道德有关，而同时也有赖于一个宽容讲理尊重教授（清华传统：导师崇高）的文化环境。这条件首先落实在一位民主而有水准的优秀校长（如梅贻琦）身上。

2月22日，校方就此事呈教育部文，其中有云：朱生论文导师陈寅恪教授，对于该系只应推荐邵循正一人，主张尤力。前经来函详述经过情形。（引处同上）

我检阅《寒柳堂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朱延丰的毕业论文即为《突厥考》）发现了当年陈先生所持的理由之一：“寅恪语朱君曰，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云云。可能还有别的理由，俟考。

朱延丰当时还兼任历史系助教，纵然如此，陈先生亦不徇情。1935年，朱终于赴英国留学，入牛津大学研究近代史，

1937年获硕士学位，再入法国巴黎大学，习欧洲史。1938年应德国波恩大学之聘，讲授中国史二年。后应国立东北大学之聘，任专任教授。

朱延丰当年对陈先生持何态度？陈先生评审其论文，觉得不成熟，“资料未备”、“论断可商”之外，还有一条建议：“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见上引《通考序》）既期望又鼓励。朱延丰没把陈先生不赞成自己出洋的事放在心上，而是恪遵师训，潜心向学，磨剑十年，再以补正后之《通考》乞教求序。《通考序》谓：朱君不以鄙见（指上引意见）为不然，遂藏之篋中，随时修正，迄于今日，忽已十年。值南海战起，寅恪归自香港，寄居雁山。朱君从三台东北大学以书来告曰，前所为突厥通考已详细补正，将刊布于世，愿得一言以为序引。

陈先生那时40出头，处事循理，发抒个性丝毫不受阻遏，于学术、人事之中实实在在显申正义，体现师道；此亦属身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弟子亦恂恂然趋于正务于直，拙于巧诈，不存机心，一意潜学，以道立身；学子处此环境，有如吸纳优质最佳“营养”，精神受惠，似若无形，如谓此关乎一生学问与做人，绝不言过。文革中整周一良先生最狠的是他历史系的学生，斗李达最惨的是李达自己的几个研究生。陈先生不主张朱延丰出洋故事要是在五六十年代，俟文革一来，朱延丰不拿铜头皮带将陈先生抽死才怪哩！此理极单纯，盖后者生不逢时，所受的是“恨”的教育，则心灵乖戾，人性刁狠亦势所必然矣。

“弟之主张绝不顾及其他关系”，昔日寻常语，今日掷地作金石声！

为了探究陈、朱师弟之间当日在处理公私事务的道德行为上，何以达到这般正大而自然的境地，我遂留心搜寻这方面的佐证。关于他们师弟关系的材料，寥若晨星，幸而 30 年前香港罗香林教授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里保存了一点消息：

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日常生活，乃至学业后的就业情况，也非常关心。记得我和朱延丰、钟道铭等初进研究院的第一年，不知怎的，朱延丰兄忽然爱上了北平女子篮球队里白白胖胖的某女士，似乎打得很热，但他不肯将她介绍给同学认识，我们几个书呆子都不免自感落伍。不过延丰兄本来也不是善交际的，果然，没有半年，就告吹了。有两个星期他没有上课，又不在宿舍里住宿。有人说他回江苏原乡去了，有人说他可能失意后有什么自杀的危险。陈师听了非常着急，特地叫我往各处去找。我和有关的同学商量了几次，又到北平找了一次，总是没有头绪。正苦没法对陈师交卷的时候，延丰兄自己回学校来了。我对他说：你优哉游哉的过了两个星期，但陈师可急坏了呢。延丰兄老不说话，后来还是我说：听说胡适之先生进行一种翻译计划，我们可求陈师介绍，做点翻译，来寄托寄托。我和他同去见了陈师，我说明延丰想兼做翻译的工作。陈师非常高兴，就写信向胡先生推荐。胡先生自然也很客气，他回信说：

寅恪先生：谢谢你的信。朱延丰先生愿译历史书，极所欢迎。他愿译哪一个时代的历史？有什么 Preference 没有？Shotwell 前告我，勿译“文学的历史”，当译学者的历史；他举 Breasted: Ancient Times 为例。我当时因此书是中学 (High

School) 用书，不甚以为然。近日读其书，始知此书确是极好的书，最能代表最新的考古成绩，而文字尤可读。1927 有修正放大本（已成为名著）。我想寻一可靠的人译此书，文字务求通畅明白，使此书成为学西洋史的人人必读的门径书。你看朱君能胜任此事吗？乞酌复。谢刚主说：你说孙行者的故事见于大藏，我很盼望你能告诉我。匆匆祝双安。降魔变文已裱好，甚盼你能写一跋。适。廿、五、三。

这封回信，陈师就交了给我，要我和延丰商量。可是没有几天，就因我接到家电，说我父亲病势转剧，要我赶快回去。我即匆匆的请假回粤。延丰兄有没有照胡先生的意思翻译，我不很清楚。可能不久延丰即找到了最为美满的对象，就是后来和他结婚的太太，自然也无需拿翻译做寄托了。

（《回忆陈寅恪先生》，1970 年 9 月 14 日写于香港，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

我根据这一点宝贵的材料再广搜穷索，终于在《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这部巨编里，找到了陈寅恪先生致胡适先生的与此事有关的两封信。其一（残）：

朱君延丰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须先缴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朱君则历史乃其专门研究，译文正确想能做到；但能流畅与否，似须请其翻译一样式，方可评定也。勿此奉陈，敬叩

著安

弟

寅恪

□月七日午后九时

这封信中提到的浦君是浦江清，毕业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1926年由吴宓先生荐入清华任陈先生的助教，故说“共事四五年之久”（迄1931年）。信的月份不好确定，像二月，又像十一月，须从原件判断。此信与上引胡适的信，不好判断其先后。胡适的信显然是复信，但这一封又不大像初荐信，似在答复朱延丰的译书能力。在未见原件（原件为八行笺，朱栏，朱墨分明，判断不难；而影印则均成墨色）的情况下，我姑且设定陈先生还另有一封初荐信。

其二：

适之先生：

前函介绍之朱延丰先生欲面谒公有所承教，敬冀接见为幸！

勿叩

著安

弟

寅恪谨启

十二月三日

这是一封由朱延丰手持，到米粮库胡同去面见胡适的介绍函。事后胡适在信笺的空白处手批让朱延丰试译的书名，是嘱经办人办理的，并且还嘱咐“寄稿纸（钢笔）二百张去。”

陈先生毕生惜时如金，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而对朱延丰的课外事务，如恋爱、译书等，如此费心尽力，可见其敬业之

诚和爱弟之挚。他把公私严格区分开来，论文未臻成熟，没有使他“发生出洋必需之信念”，他即力主不派朱延丰出洋，尽管是自己指导的弟子。像这样光明磊落的师道，又已经于朱有了几年关爱之情的基础，作为当事人的朱延丰，尽管不无失望之憾，又怎能对这一身风义的导师生丝毫的怨尤呢？

这就是这一对清华师弟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一桩具体事务的处置上所显露的学术精神。我无意于美化或夸大它，只就事实揭示其文化意义及精神价值而已。

作为今人的我辈，假如一直生存于一个良性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假如当年那样的学术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发展迄今，未经中断、摈弃或绞杀，也许这些历史沉埋中的琐事在我们的阅读中就一掠而过了；但现实的“矫情”，却造成了我们这几代读书人精神上的失落、无奈和遗憾。正是这种过于长久的“失落感”和“遗憾感”及无奈心境，却意外地培养了我们的一份敏感，才见到了这些沉埋物中的“琐事”的吉光片羽，顺手将它提掇出来，公诸同好，聊以慰藉良知未泯者（数代人的多数已麻木或认同了虚伪“价值”和强化观念）的怀旧之思和惋惜之情，只有这部分人才是具有信念召唤这类真价值复归的守望者！

去年曾有某先生批评谢泳先生对某些“旧人旧事”有过于美化之嫌，我则不以为然。谢泳的研究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海市蜃楼式的“研究”或滥情感发之文并不能取信于读者。我并不认为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清华、北大及西南联大的历史传统都是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不是少量，是大量，但并不掩盖正面主流。近年我在采集近现代思想学术

史料的过程中，也获得和积累了大量负面的材料，只要文化环境不至于限制吾侪之口与笔，我将分批将之披露于世，以印证历史的长期“改扮”、“包装”和欺瞒。不过我要预告于读书界的朋友们：这些负面的东西的导演者和责任承担者，不是蔡元培、胡适、陈寅恪、梅贻琦等人，而是另一批高调唱得响亮来兮、悦耳动听来兮（公开），却又“要感谢皇军”，“部分对日，部分对顽，部分保存实力”（对内）的先生们。

我虽然自己不在大学，但我在各主要大学里都有众多朋友，故而我知道一些当今大学里的故事。我现在挑选一个与陈、朱师弟故事相当切题的故事来述说一下。在南方一所名牌大学里的一位终身教授，他的一位得意的博士弟子只有一部专著，却因为这位教授在该校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其博士弟子也就在数年前评上了博导，而迄今仍只一部专著。这位弟子对恩师趋奉惟谨，在前几年一次博士招生中，他将数份试卷寄往美国，让正在那边讲学的恩师亲自裁定遴选，而不惜耽搁其他众多博士研究生的录取。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朱子学专家跟我聊天时告诉我的。我的转述，线条虽粗，事实却真。我不大了解他们的人性和思想，但我可以从他们的教育背景来探究他们立身行事的某些消息。教授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从大学毕业。他的青、少年成长期横跨两个时代：40年代和50年代。40年代后期的特点是学潮蜂起，50年代前期的特点是学生批判、斗争教授。当年不择手段地策动学潮和不顾后果地利用学生，总不会“雁过无痕”，总要在那些正反两方面当事人的心灵史上留下一些“雪泥鸿爪”，必然会产生一些有形或无形的回应的。这两对师弟的教育背景绝然不同，其学术精神和在公